



二十一世纪的精神与信仰展望
论中国人的忧郁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4

“宽恕在死亡的田野里死了”，
世上还有宽恕吗？

跨文化对话

Dialogue
Transcultural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人类第三个千年的目标
是要与相互尊重
法国知识分子的三部曲：
教师、作家、名流

跨

文化对话

4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上海
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陆震伟

跨文化对话(四)

主编〔中〕乐黛云〔法〕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 经 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6×939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7-80646-211-2/I·292

定价: 19.00元

本丛书列入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

面向未来的文化向文序

《跨文化对话》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音序排列)

中国委员

- 丁光训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金陵神学院院长,宗教学家,教授
丁石孙 北京大学前校长,数学家,教授
季羨林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印度学专家,语言学家,教授
李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教授
厉以宁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教授
庞 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教授
任继愈 北京图书馆馆长,哲学家,教授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家,教授
王元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张岱年 中国孔子学会会长,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张 维 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学家,教授

西方委员

- Mike Cooley 英国布莱顿大学技术科学委员会主席
Antoine Danchin 法国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生物学教授
Umberto Eco 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系教授,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哲学家
Xavier le Pichon 法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地质地理系主任、教授
Jacques Louis Lions 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
Carmelo Lison Tolosana 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孔普鲁登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
Alain Rey 法国词典学家,国际词典学联合会主席

《跨文化对话》编辑委员会成员

主编 乐黛云教授(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与传真:(010)62752964

E-MAIL:Tyjydy@pku.edu.cn

主编 李比雄教授(Alain Le Pichon,欧洲跨文化研究院)

通讯地址:Universite de Cergy - Pontoise, 33bd du port 95011
Cergy - Pontoise

电话:0033 - 1 - 34256166 传真:0033 - 1 - 34256267

E-MAIL:lepichon@paris.u-cergy.fr

执行主编 钱林森教授(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025)3594733 传真:(025)3309703

E-MAIL:lsqian@nju.edu.cn

执行副主编 杨正润教授(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025)3593917 传真:(025)3309703

E-MAIL:zyang@nju.edu.cn

执行副主编 郝铭鉴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021)64372608 传真:(021)64332019

E-MAIL:cslem@public 1. sta. net. cn

编委会巴黎联络处主任 金丝燕博士、副教授(Dr. Jin Siyan, 法国阿尔瓦德大学)

通讯地址:15 Rue Victor Cousin, 75005 Paris, France

电话:0033 - 1 - 56240483 传真:0033 - 1 - 56240921

执行编辑 李国强副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021)64372608 传真:(021)64332019

E-MAIL:cslem@public 1. sta. net. cn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人们都在思考未来。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纪念波洛那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主题演讲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但是,在承认差别的情况下,人类如何沟通呢?人们可以用一种共同语言来讲述差别吗?物理、数学语言似乎是一种通用语言,但它真能完全脱离它所归属的文化吗?要真正理解法国数学学派和中医,不用法语和汉语行吗?埃柯提的问题很有启发性。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能生物,同则不继”颇有相通之处。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和协调各种差别的“礼乐”精神一定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的重要精神资源。

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于1999年末发表了他长期思考的《世纪与宽恕》一文,通过对“宽恕”一词的字源探讨、词义辨析以及应用的误区等研究,论述了作为人类沟通主要手段的语言所存在的模糊性、歧义性和难于避免的、有意无意的误用和误读。

参加本辑圆桌会议的学者关注未来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提升问题。台湾辅仁大学李震教授强调人性的复归,英国伯明翰大学邓守成教授预见到二十一世纪有形的、体制的宗教影响力会越来越小,而无形的宗教经验与认同则可能越来越深,因此希望宗教在未来世纪的对话有益于抵抗社会异化和民族主义带来的危机。青年思想家刘小枫博士指出二十一世纪的根本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有共识的政治精神基础,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还会面临一个精神冲突的时代。他强调必须充分认识西方精神的现代分裂及其在新的语境中对自己的不断重新解释,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汤一介教授将数千年的旧传统和几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结合在一起,分析了当世权力崇拜和金钱拜物教所形成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及其在二十一世纪的可能走向,并指出了美德和信仰所能提供的善的选择。钱文忠先生则对以上讨论作了很具特色的回应。

这一辑的文章大体都是围绕着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来发言的。法国驻中国大使毛磊先生强调了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梁燕城教授提出在长久零碎化和离散之后,需要一个重新建构的时代;谢夫莱尔教授指出人性是同一的,所有人都是某种人类文化的载体,应该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平等的尊严;中西进、顾彬两位教授则从跨学科、跨文化的高度讨论了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一些文化问题。

《跨文化对话》第四辑

目 录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海外专递

寻求沟通的语言

[意]恩贝托·埃柯(1)

世纪与宽恕

[法]德里达(10)

圆桌会议

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

汤一介/乐黛云/李震/邓守成/刘小枫/杨熙楠/钱文忠(24)

前沿碰撞

比较文学方法研究及新世纪发展前景

[法]谢夫莱尔/钱林森(56)

多声道

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法]毛 磊(62)

耗散结构和老子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

[日]中西进(71)

建构性的后现代思想

——后后现代的中国哲学动向

[加]梁燕城(81)

论中国人的忧郁

——一个基本框架式的尝试

[德]顾 彬(88)

比较文学走向总体研究之我见

萧 兵(100)

文化透视

- 悲秋:中国古典诗学研究 [法]郁 白(104)
误读,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 祖 慰(112)
-

说东道西

- 漫游者的故事(一)
——西旅日记 王以培(123)
-

文化随笔

- 大美不言(上) 范 曾(131)
-

历史回眸

- 叩击中国之门(下) [西班牙]卡梅洛·利松·托洛萨那(134)
-

要籍时评

- 德布雷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读德布雷《教师、作家、名流:现代法国知识分子》
周 宪(160)
-

信息窗

- 《远近丛书》中文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179)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9)
-

- 征稿启事 (180)
-

本辑作者介绍

恩贝托·埃柯

Umberto Eco(意大利)

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系
教授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法国)

法国著名学者

汤一介(中国)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与哲学
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震(中国台湾)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守成(英国)

英国伯明翰大学传教学与
世界基督教中心教授

刘小枫(中国)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
所学术总监

钱文忠(中国)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
所研究员

谢夫莱尔 Yves Chevrel(法国)

法国索邦大学教授

钱林森(中国)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教授

毛磊 Pierre Morel(法国)

法国驻中国大使

中西进(日本)

日本大阪女子大学校长、教授

梁燕城(加拿大)

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
席

《文化中国》主编

顾彬 Wolfgang Kubin(德国)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

萧兵(中国)

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郁白 Nicolas Chapuis(法国)

法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

祖慰(中国)

旅法作家

王以培(中国)

旅法学者

范曾(中国)

南开大学艺术史教授、画家

梅卡洛·利松·托洛萨那

C. Lison Tolosana(西班牙)

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

周宪(中国)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寻求沟通的语言^{*}

[意]恩贝托·埃柯

我想与你们探讨的是语言的通用性问题。这既是科学界广泛争论的古老梦想，也是从欧洲角度研究文化行为的人类学所投下的一笔赌注。

我觉得民族特性是建立在被视为研究精神(神圣的)过程的最普遍、最空想、最神圣的科学之中的。所以，文化人类学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学派为什么会建立在法国，而不在英国呢？

我觉得我们正面临，并且越来越面临着一个双重的矛盾。一方面，在这个计划中，有人们称之为“文化归属”的东西，而且通过多种定义来确定的。对于欧洲来说，第三个千年的前景，并不是美国式的熔炉——况且永远也无法实现。美国多种族社会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熔炉。在那里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区，犹太人在另一个区，波兰人则在另外一个区。可以想象，他们不会像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那样相互厮杀。除了某个时期的洛杉矶和芝加哥以外，他们几乎能以一种相当平静的方式生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大陆上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昨天读了一本小册子，类似于《我知道什么？》，谈的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常使我感到困惑。因为尽管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后现代主

* 本文是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教授、《跨文化对话》学术委员会西方委员恩贝托·埃柯(Umberto Eco)在波洛那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主题演讲。根据录音翻译，未经本人审阅。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

义作者，但是我从未能够确切地理解它的含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在于减少差别而是在于更多地发现差别。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因此，欧洲面临的不仅仅是对现存差别的承认。我认为，五十年后的欧洲将成为一个有多种肤色并存的大陆。在那儿，十年前在波兰出现的要不要建立清真寺之类的小问题将成为过去。欧洲将出现为数众多的清真寺。同样也会出现新的移植。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佛化的新教、独断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者的自由主义、东正派的耶稣教义以及穆斯林的芳济各会等等。新时代的哲学形式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应该充分地重视它。我们在 2000 年的任务是做好接受任何差别的准备。因此，对于文化归属的第一个矛盾，似乎是人们正在与科学家们一直梦寐以求的统一方向背道而驰。这样，对于科学家来说，就有了一个同样艰巨的工作要做。因为承认差别就意味着要解释它的存在。当具有一定的伪善、一定的道德以及一定的良心自责的白人，由于“白人的负担”（white man burden），在一定的時候佯装出这些差别似乎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在巴黎，在埃利·维埃泽尔所主持的国际文化学院倡议编写了一本教材。它本来该是一本对全世界儿童进行宽容教育的教材。大家工作了几年，结果发现这是做不到的；虽然在每个国家都找到了准备出版这本教材的发行者，但我们觉得无法用一种统一的语言对全世界的孩子们说话。比如说，要给一个新几内亚的孩子解释燔祭的意思：可他连地中海或欧洲都不知道。考虑到不管是中国的、阿拉伯的、法国的还是德国的教师，都会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文化常识，我们曾决定给教师们编写一本这样的书。但即使是教师，我们发现给他们举例也很困难。因为例子随着文化和国别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基本办法。即在因特网上设立一个网站，投下所谓的“诱饵”。有人说，进行这种类型的尝试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就等待你们的反应了。这将成为一个真正开放性的网站，因为不久就轮到新几内亚的教师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用这些

成果去尝试,孩子们像这样回答了……”

总而言之,我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词语的选择。我们不能谈种族主义,也不能拒绝种族主义。因为我们如果使用“种族主义”这个词,就得给种族主义下个定义,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删去了“宽容”这个词,因为在某些语言中“宽容”有一种否定意义——人们容忍的是他所不喜欢的。最后我们用了接受多样化、接受差别诸如此类的话。虽然这在法语中会令人想起“差别万岁”。但说到底,这是个文化归属的问题。由此,我们发现要找到国际性公式是何等的艰难啊!

我们应该给孩子解释的而且是我们已经发现的第一件事是:第一,差别是存在的,必须强调差别;第二,承认和忍受差别没有丝毫坏处。当然,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来自不同文化氛围的人气味是难闻的。就像我对于他们来说也有气味一样。夏天,坐在一列欧洲火车上的时候,我从气味上闻出了美国人,因为他们吃的、喝的与我们的不同;他们出汗时有一种不同的气味,我能辨认出这种差别。惟一不会令我不适的气味则是我本人的气味。这一点很奇怪,也应该教给孩子们。一旦我们具有连烦恼的事都能接受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

第一个矛盾:矛盾的存在使得人们趋向于文化归属的多样化。每个人不仅继续从属于一定的民族族群群落,而且越来越从属、越来越强调他们不同的文化归属。诸如作为集邮者、法国人、异性恋者、男人等等。如果科学,尤其是硬科学有了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差别教育。

另一方面,我发现科学中普遍存在着矛盾。不仅指以确定一种通用语言为目标的自然科学——这是显而易见的,物理语言、数学语言以及分类学语言都是通用语言;只要进入科学领域,不管对于中国人还是对于非洲人来说,鸭嘴兽都是单孔目动物。然而,大家都知道即便自然科学和硬科学也都是从属于文化的。它们从属于文化是因为它们属于一个无法分解的天地。在文化的范围内,人们给出某一概念的定义。有时它比我们想象的更从属于文化。

因为法国的相对论或是德国的相对论显然是不存在的。但法国数学学派以及中医不管西方接受与否,都是存在的,而且建立在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原理之上。

所以惟一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讲述差别吗?这是一个为孩子们提出来的问题。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共同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应该在西方工具语言(在这个网站上,我们讲英语和法语,估计中国人和非洲人都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和母语之间进行区分。科学历经了几个世纪,梦想找到一种通用语言,有时甚至以为这种语言已经找到。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在形式逻辑和科学领域里,可以用这种语言来讲述某些事物。当然并非所有事物。例如不包括文化归属的差别等。你们知道,在六十年代有个叫弗罗登台尔的人,曾经针对外星人设计过一种叫做 Lincos 的语言。无线电波开始发现一个最小的共同元素之后便能得出结论。他的基本假设是:一种通用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外星人的数学概念与我们的相同。接着他以 pit, pit, pit, pitpit, 这样的信号开始,先接一个符号,然后接两个,慢慢地形成一种巧妙的方法。如果外星人懂得我们的数学概念,交流就可以进行了。这个假设的反对意见是:他们有这种数学概念吗?如果他们有,他们能用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些概念吗?而且,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逻辑命题吗?——问题在于,在缺乏元语言的情况下谈数学,无异于对数学方法的卖弄。我们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 Lincos 计划可以实施,外星人也没有给予我们答复。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入括号。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提出了问题的终极:我们不能用媒介语言说话,我们没有一种像元语言那样的通用语言。那么我们能否不用元语言说话呢?再回到媒介语言这个话题上,这种媒介语言是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因种种原因(偶然的)英语战胜了斯瓦希里语。媒介语言可以让我们像使用元语言那样谈论文化差别吗?如果人们承认翻译是可行的话,那它也是可行的。你们知道,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翻译是可行的吗?

不错,从我们阅读译著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可行的。然而我们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所读的译文可以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吗?这些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到不同于我们自己的那种文化差别吗?或者,完美的翻译是有的,因为如果科学运用一种媒介语言,那么应该可以期望完美翻译的出现。人们可以接受对诗的不完美的翻译。但对于科学来说则不行。它力求完全的同义。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都同意的一个原则,即全世界的人都赞同的仅有的几个原则之一,就是完全的同义是不存在的。这儿说个小小的趣闻:在建立学院网站的过程中,一组为人权而工作的男女开始干活了,人权概念用法语表达是很理想的。可是可以说,这是人们第一次为人的权利而一道工作。英国人把人说为 human beings(人),可是美国人的幼稚让人很吃惊。如果他们用 mankind(人)指人,他们就觉得有性别歧视的味道,因为 man(人)指男性;但如果他们讲 humanity(人类),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性别歧视。因为他们不知道从词源上说明 human(人),即 homme(人)和 Homo(拉丁语:人)是一回事。因此在英语中,从政治角度看,说 Human being 是对的,如果说 mankind 就不正确了。而在法语中,倘若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 les êtres humains(人类)同 les droits de l'homme(人权)是一回事。这说明由于内涵的差异,Droits de l'homme 并不是 Human Rights 的同义词。然而,从我们周围所见到的事物来说,同义词无法找到不仅仅是经验上的问题,而且应上升到严格的理论高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b 是法语中的一个表达方式或用语,q 是英语中的一个用语,如果这两个用语自乔治·梅里叶(Méliès)以来,都用一种幻想的通用语言中的 X 表达,那么在确保同义的情况下,将 b 和 q 相互翻译出错的可能就小得多。如果真的存在 Mentalis 语言,我们就拥有了一种通用语言,它或从属于自然科学和硬科学,或从属于软科学和跨文化的内涵。

直到现在,我们的 Mentalis 只能用来讲述为数不多的事物。而非全部。例如无法说出苹果蛋糕的做法,或是说出科涅克(一种白兰地酒,产于法国的科涅克)与威士忌的差别(这是事实)。撇开这

一点不谈,还有一种更为严肃的反对意见。即来自第三者的意见:为了说明 c 等于 q , 必须说明 c 与 x 相等; 而为了说明 c 等于 x , 必须要有个中项 w ; 为了说明 c 与 w 相等, 必须有另一个中项 k , 如此无穷无尽。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这个基本的机械定理。因此, 通用语言的每个梦想都会使我们陷入到第三项的悖论之中。

与此相反, 翻译所运用的媒介语言是存在的。但人们遇到了翻译中的真正问题。我想给你们举个常使我着迷的例子。即怎样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呢? 你们知道这部俄语作品有一个特点, 即书的前三页是用法语写的。这是当时说法语的俄国贵族的一段对话。他们说法语, 这一点很重要。除了那些特别有教养的人以外, 俄国读者不可能读懂。但这段法语是不可忽视的, 因为它反映了波拿巴出征俄国前俄国贵族身分上的社会差别。这薄薄几页法语却是作品的主要部分。怎样将《战争与和平》译成法语呢? 最笨的方法是注上“文中是法语”, 读者不会对此惊讶; 另一种办法是为了将这种身分告诉法国读者而将前几页变成俄语或英语, 但这更具欺骗性了。俄国贵族讲英语不符合实际, 他们讲的是法语。我还给自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战争与和平》的中译本里的前几页是法语还是比如说俄语呢? 但这都不可能。如果中国人将它们写成法语还能说得过去, 可法国人就惨了。我没有研究过《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我所能找到的惟一办法是将这几页换成十八世纪的法语, 即换成古法语, 给读者留下贵族身分的印象。甚至很可能在文中不经意地出现这样的话: “Comme le prince Bolkonski disait dans son français habituel.” 以便给法国的读者以俄国贵族当时说法语的感觉。我之所以谈及这段小插曲, 是因为翻译是可行的。它不是建立于同义和语言关系的原则之上, 而是建立在逻辑翻译中称之为透视法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有必要在这段文字的处理上下个赌注。托尔斯泰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贵族身分的感觉。于是我采用了这种办法。如果要产生的是另外一种效果, 我也许会采用其他方法。由此, 你们可以看出如果在没有同义和通用语言的情况下, 运用翻译原则的惟一方法, 恰恰是承认这些外来的东西

及其差别极大的文化归属。一旦承认了它们，就应该将之还原本色并翻译出来。因此即使在最好的翻译中，也须意识到在不同的语言中的两句话之间，是没有一致与统一的。确切的说只有差别。

我还想着重讲一下一个历史事例。它告诉我们，把一种通用语言准确地建立在科学原则上的最有趣尝试，是如何显示出这种根本缺陷的。

我写了一本关于寻求完美语言的书。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即要寻求一种完美语言，一种高贵语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曾以为这种语言是原始的希伯来语，到了十七世纪又以为是中文，而在此以前人们还以为是埃及语。在人们采取组合方式为建立通用语言而作出种种尝试之后的十七世纪，在英国皇家学会这个承袭培根思想的地方，法语成了一种与所有科学建立在同一原理之上的理性语言。正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给自然分门别类。分类的方案不尽相同。但在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最觉得意外的和最觉得有意思的方案，是受中国表意文字启发的。它的每个符号都与习俗没有关系，而是与它所表达的现实事物模样十分相似。而且符号的构成也和我们的自然语言不一样。有发音的部分，有表义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含义。既然在某种分类法中人们可以用树根和最具环形的树叶来给乔木下定义，那么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种现实的总体分类，规定这种分类的每一个因素都有一个实际的符号，即表意文字。这种语言可以将已经组织过的概念传递给我们，这是做得到的。威尔金斯着手进行了这项分类工作。虽然今天的科学家们嘲笑他的分类法，但在当时，那已经算是典范性的尝试了。当他走到这一步时，还没有太多的类似于现在词典这样的资料，只能参考百科全书上的说明而已。狗与狼的惟一不同，只是狼吃母羊而已。这对辨认出狗和狼是远远不够的。但威尔金斯的语言中更主要的缺点还不在这里（这也该算个大缺点），它为我们对事物进行了分类，但却无法为我们确认事物。因而就不能用实际的特点使我们某天在森林里辨认出狗和狼。这种语言显示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分类的资料不够，若要讲述